

哪类生育支持政策更能促成 高学历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

——基于服务支持、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政策的视角

徐美琪，熊心愚

[摘要]在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索高学历群体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前瞻性价值，而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基于2022年对女博士开展的“高学历女性生育意向”专项调查数据，首次探究了高学历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状况，重点揭示了对提升二孩生育意愿最有效的政策类型，并识别出对政策支持反应积极的群体特征。研究发现如下：其一，生育政策需求存在职业发展倾向异质性，职业发展动机较强的高学历女性对时间支持政策（如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等）需求相对较弱，对服务支持政策（如就业友好型政策）的倾向性更强；其二，现行政策供给与需求存在差距，产假时长和养育补贴发放周期均未达到高学历女性的期望；其三，三类政策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服务支持型政策促进效果最优，经济支持型政策次之，时间支持型政策最后；其四，生育支持政策呈现困境缓解效应，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对遭遇过生育困境的群体的生育意愿促进作用更为突显，体现了生育支持政策“雪中送炭”作用。

[关键词]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人口结构平衡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人口减少、老龄化和区域人口的增减与分化的人口发展新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

[收稿日期] 2025-06-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背景下普通高校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72474028)。

[作者简介] 徐美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电子邮箱地址：xmqq@mail.bnu.edu.cn；熊心愚（通讯作者），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axiong@swin.edu.au。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24 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99‰ ,可见我国面临的人口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制定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的学历水平持续提升。研究表明,该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稳定的线性增长趋势,年均增幅约为 0.1 年(牛建林,2021)。我国劳动人口学历普遍提升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精准化实施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有研究显示对于女性群体和高学历群体而言,延长产假、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低于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陈滔和胡安宁,2025)。这说明对我国不同学历群体而言,最能促进其生育意愿的政策组合并不相同,简单叠加各类生育支持政策无法达到对高学历群体生育意愿的最优促进效果,需要具体考虑高学历群体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真实需求。因此,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学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研究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简单基于目前人口的需求,更要着眼于未来高学历劳动力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规模已达 4000 万,占全国科技人才总量的 40%,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3%),凸显我国高素质女性群体的规模优势。然而研究发现,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对于各类单位负责人以及蓝领职业者而言,其意愿生育的数量是最少的,但其生育潜力最大。此现象表明高学历女性劳动者是最需要生育政策支持群体(杨慧,2023)。

学界研究证实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因素(王跃生,2016)。政策手段是有效减轻生育与抚养的经济负担,延长女性的生育窗口期,进而提升人口生育率的有效途径(张川川和葛润,2024)。因此,在我国劳动人口学历水平持续提升、高学历女性劳动者规模较大且政策支持需求较为强烈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能够有效提升该群体生育意愿的政策支持,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蕴含着前瞻性的政策价值。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家庭普遍将生育一孩视为基本家庭需求,而二孩生育决策则主要基于第一个孩子的养育体验(王维国等,2022)。而且国际上通常以总和生育率 2.1 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平衡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二孩生育意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综上,在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并存、我国劳动人口学历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索高学历劳动人口对于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具有重要前瞻性意义。由于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关键作用,探索能有效促进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生育支持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二、文献综述

(一)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现状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生育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服务型支持、时间型支持和经济型支持政策(宋健和姜春云,2022)。其中服务支持主要包括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儿童的教育服务和课后照料以及女性的就业服务等;时间支持主要包括女性产假、夫妻双方育儿假以及男性陪产假等;经济支持主要包括发放生育补贴和养育补贴,在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框架对我国现行生育激励措施进行了梳理。

从服务支持政策的角度来看,2024年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①,超三成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现有托位缺口较大。在子女受教育方面,多孩家庭入学优惠政策有限,部分地区实施二孩、三孩自主择校,学费减免等政策。例如,龙港市三孩在本市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就学,学费全免;三孩家庭子女可免费享受托管服务。

对于经济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中央与地方协同的育儿补贴政策体系。在国家层面,建立了覆盖所有孩次的普惠性育儿补贴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育儿补贴方案。各地区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较早,但其提供的育儿补贴大多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仅有部分区域将补贴范围延伸至一孩家庭,且补贴方式及金额差异大。具体而言,各省市除发放一次性补助外,另有按年发放和按月发放措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发放至孩子年满3周岁,只有少数地区,如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育儿补贴发放至年满6周岁。不同地区发放育儿补贴的金额标准相差很大。例如,同样是一次性支付,云南省对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一次性补助分别为0.2万元、0.5万元;深圳市一次性补助分别为0.5万元、1万元。石河子市、哈尔滨市等地给0—3岁的二孩、三孩家庭每月分别提供500元、1000元补贴。我国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②于2025年7月28日正式公布,虽然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制度发布

① 《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情况的报告——2024年9月10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9/t20240911_439363.html。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7/content_7034132.htm。

较晚,但其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大,全面覆盖所有孩次。实施方案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在时间支持政策方面,我国对于产假的基本规定是:98天+各地奖励天数。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公约有“妇女须有权享受不少于14周的产假”的规定,14周即98天。我国女性产假时长和男性陪产假时长各省份规定不尽相同,产假时长在98天至190天(西藏例外,为365天),我国多数省份男性陪产假为15天,一些省份,如吉林和内蒙古等延长至25天。

(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现状

随着人口转变和家庭模式变化,“低生育率”陷阱给全球各国带来巨大挑战,OECD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OECD国家从重视家庭福利政策逐渐向注重生育支持政策转变。虽然各成员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框架相似,但因措施重点各异、投入强度不一等因素,政策成效呈现明显差异。根据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化走向,OECD国家可划分为三大类别^①:

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选择性的家庭主义”模式,结合“再家庭化”与“去家庭化”政策,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早,支持体系完善且力度大,近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维持在1.6以上。其生育支持政策举措如下:(1)在服务支持方面,法国家庭补助保险管理机构(CAF)与地方组织合作,提供3岁以下幼儿服务及育儿保姆补贴(杨菊华和杜声红,2017);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以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2)在时间支持方面,法国设置16周产假、11天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3)在经济支持方面,提供孕期一次性生育补贴(每孩948.27欧元)及6—18岁子女学年津贴(每学年400欧元)和大学补助金(每年约15000欧元)。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再家庭化”政策以鼓励家庭化育儿(黄玉琴和萧易忻,2017)。德国从21世纪初即重视人口问题,政府不断提高生育政策支持力度,总和生育率从排名倒数逆势提升至1.5左右。其生育支持政策包括:(1)在服务支持方面,为满一岁儿童提供托幼资助,实施“托儿所+”计划以满足家庭需求,2020年0—2岁入托率近40%。(2)在时间支持方面,国家提供14周产假及平等育产假,子女三岁前最长三年育儿假(带薪一年),公司保留休假父母的职位,夫妻双方可领取父母津贴或从事兼职,双方兼职可额外获

^① 任泽平,《中国生育报告2024》, https://mp.weixin.qq.com/s/X_-dhcMwM8E5DJgIpD1Z-g。

得伴侣合作奖金。(3)在经济支持方面,德国在住房领域引入“子女建房津贴”,每孩补贴12000欧元。此外,德国还免除大学学费,减轻家庭教育负担。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生育支持也延伸至社保领域,保证有孩家庭领取失业金额度高于无孩家庭。

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两国传统家庭模式固化且生育支持力度不足,总和生育率降至1.3以下,成为生育率较低的典型国家。日本采取强化家庭化政策,强化女性家务及照护责任,鼓励男性外出工作,具体措施包括扩建日托中心、加强课后项目支持、提供产假及育儿假(女性最长58周,男性52周)、一次性生育补贴42万日元、提高儿童津贴至每月10000日元及育儿假期间工资比例至50%等。韩国则倾向于男女共同就业育儿,实施措施如补助6个月以上婴儿托管服务、鼓励幼儿园周末进行托育、提供产假及育儿假、一次性生育补贴100万韩元及0—5岁婴幼儿保育费或家庭养育津贴等。尽管如此,日韩生育率仍跌破1.3,深陷“低生育陷阱”。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日韩生育率下滑到极低水平后,才启动生育支持政策,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生育率下滑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实施的政策措施不符合国情,且补助较低,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了工作与家庭矛盾,韩国则由于其制定的政策措施“一刀切”,不能完全满足国内不同生育观念民众的需求(朱荟和苏杨,2019)。较低的福利补贴无法达到希望通过家庭抚养孩子的女性的需求,想继续工作的女性会面临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因此使得生育率下滑严重。

(三)政策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评估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服务支持、时间支持、经济支持作为三类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从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来看,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的目的在于降低女性的育儿压力,促使女性回归劳动市场,而经济支持目的是减轻生育的经济成本,以及补偿女性因为生育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张洋和李灵春,2023)。

在服务支持型政策方面,公共托育服务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托育服务可及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家庭想生育二孩的概率会增加20.3%(石智雷和滕聪波,2023)。在影响机制方面,托育服务能够通过就业释放效应和闲暇释放效应大幅提高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陈梅等,2023)。此外,普惠优质的教育资源及促进女性工作生活平衡也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会随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增加而提高(杜晓静等,2023);降低家庭教育支出、促进普惠教育、缓解教育压力等系列政策,

也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陈祥梅和宁本涛, 2024)。在女性就业方面, 现有研究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蒙克, 2017)。国外的研究也显示在失业率较低的地区, 感知到的工作不安全感会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可能性变低(Glavin et al., 2020), 这说明女性友好的就业环境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路径。基于以上文献梳理,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服务支持型政策对于提升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在时间支持型政策方面, 我国的研究显示, 将产假长度从 2016 年改革之前的平均约 129 天增加到改革之后的平均约 155 天, 能够将尚未达到生育限额的妇女的生育意愿提高 0.0614, 且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刘畅和靳永爱, 2022)。来自挪威和瑞典的数据显示, 男性育儿假与家庭继续生育决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对于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言, 母亲拥有较长的育儿假与其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决策呈显著正相关(Duvander et al., 2010)。从澳大利亚推出带薪育儿计划来看, 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女性, 带薪育儿假能使其生育意愿增加 16%, 且这种影响多集中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中(Bassford and Fisher, 2020)。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时间支持型政策对于提升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在经济支持型政策方面, 澳大利亚“婴儿鼓励金”政策对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均有促进作用(Drago et al., 2011)。此外, 儿童的养育补贴和住房优惠也会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西欧国家的儿童保育补贴每增加 10%, 终身生育率将增加 0.4%(Kalwij, 2010)。挪威的数据显示提供育儿补贴能够促使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Aassve and Lappegård, 2009)。韩国的数据显示: 对于年轻已婚家庭而言, 入住政府专门设计的公共租赁住房后, 有 55.7% 的人生育意愿有所增加(Kim and Jang, 2024)。由此可见, 生育养育补贴和住房优惠能够提升民众生育意愿。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 经济支持型政策对于提升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在对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方面,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了详尽系统的分析。但就面向我国的研究而言, 较少有文献直接关注高学历群体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 目前研究多从整体视角、流动人口视角等关注生育政策支持体系。但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 高学历群体会逐渐在人口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

研究高学历群体的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价值。

为此,本文在探索高学历女性对于生育支持政策需求的基础上,首先深入分析生育支持政策对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其次通过计算排列特征重要性揭示对提升二孩生育意愿最有效的政策类型,最后通过异质性检验识别对政策支持反应积极的高学历女性群体特征,为制定精准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三、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22年在全国进行的“高学历女性生育意向”专项研究,该调查采用自填式问卷,受访者为女博士或在校女博士研究生,有效样本数据为1030条。样本数据通过问卷信效度检验,代表性良好。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选择已经生育一孩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共提取有效样本470个。样本特征如下:470个有效样本均有过婚姻经历且至少育有一个孩子;在地域分布上,样本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51.91%),随后依次为中部(25.32%)、西部(15.53%)和东北地区(7.23%);从代际构成来看,80后(33.83%)和85后(39.79%)构成本研究的主体人群,75后和90后分别占13.83%和12.55%。

(二)变量选择

Miller和Pasta(1993)曾提出影响生育意愿因素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个体的生育意愿受价值观体系(Value Systems)、个人特质(Personality Traits)、生命周期(Life-cycle Factors)、家庭背景(Family Background Factors)、环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生育动机(Childbearing Motivation)等6个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基于Miller和Pasta提出的理论框架,结合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梳理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各变量测量方式和具体说明详见下文。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为0—1变量。被解释变量根据问卷中问题“您至今已经生育了几个孩子?”和“考虑到实际情况,您打算生育的所有子女数是?”整理得到。已育2孩及以上的样本赋值为1,仅育1孩的样本,若计划生育总数大于等于2则赋值为1,否则为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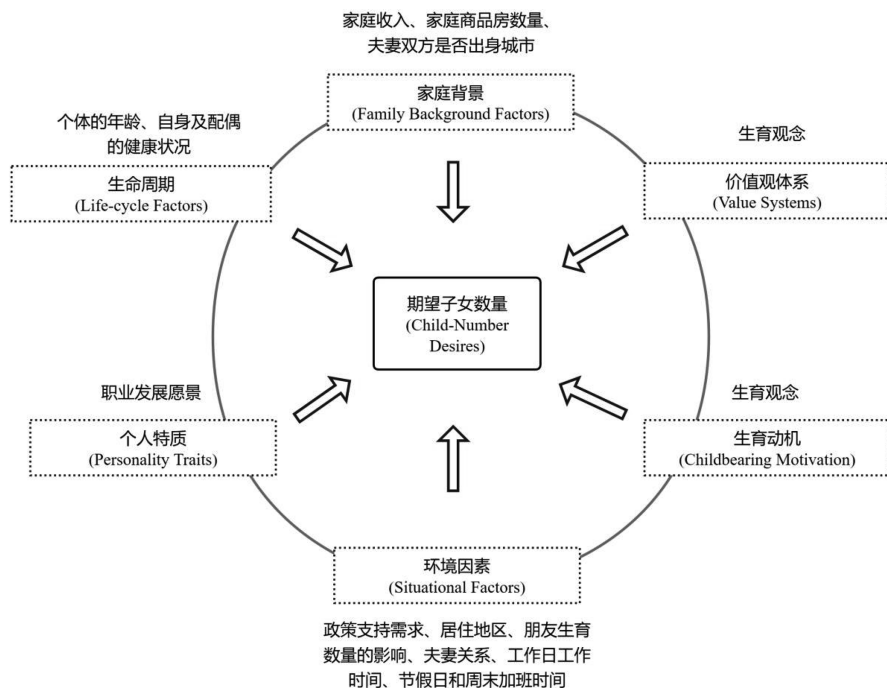


图 1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生育支持政策需求，主要包含服务支持、时间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等 3 个方面政策支持需求变量。其中服务支持包含“就近、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0—3 岁)”等 5 个具体变量；时间支持包括“延长产假”等 3 个具体变量；经济支持包括“发放养育补贴”等 4 个具体变量。受访者在上述 12 个具体的政策支持需求选项中根据自身对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观重要性判断选出 6 个最重要的选项并进行排序，排序为 1 的选项赋分为 6，排序为 2 的选项赋分为 5，以此类推，排序为 6 的选项赋分为 1，未选中的选项赋分为 0。

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依据 Miller 和 Pasta 提出的框架纳入控制变量。对于价值观体系与生育动机，本文引入生育观念(少生优生观念赞同度)进行衡量；对于个人特质，本文控制个体的职业发展愿景；在家庭背景方面，本文对家庭收入、家庭商品房数量、夫妻双方是否出身城市进行控制；在生命周期方面，本文控制个体的年龄、自身及配偶的健康状况；在环境因素方面，除核心解释变量政策支持外，本文对居住地区、朋友生育数量的影响、夫妻关系、工作日工作时间、节假日和周末加班时间进行控制。

上述变量设置与描述详见表 1。

表 1 变量设置与数据描述

变量名	衡量方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愿意生育二孩	打算或已经生育二孩赋值为 1，不打算生育二孩赋值为 0	0.5191	0.5002
核心解释变量			
服务支持			
就近、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0—3 岁）		3.5489	2.5561
幼儿园“上得起、上得好”（3—6 岁）	排序为 1=6；排序为 2=5；排序为 3=4，排序为 4=3，排序为 5=2，排序为 6=1，未选中=0	2.7191	2.3249
能就近享有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		3.1426	2.0668
孩子离园或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		2.4915	1.9599
友好型的就业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权利		1.8830	2.0003
时间支持			
延长产假	排序为 1=6；排序为 2=5；排序为 3=4，排序为 4=3，排序为 5=2，排序为 6=1，未选中=0	1.4596	1.8987
设立男性陪产假		1.0128	1.6648
设立育儿假		1.2468	1.8011
经济支持			
在妇女怀孕、产假期间发放生育补贴		0.9468	1.6087
发放养育补贴	排序为 1=6；排序为 2=5；排序为 3=4，排序为 4=3，排序为 5=2，排序为 6=1，未选中=0	1.2702	1.7368
二孩及以上家庭摇号优先或购车优惠		0.3404	1.0726
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或购房优惠		0.7957	1.5428

续表

变量名	衡量方式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年龄	2022 年实际年龄	37.4362	4.3995
家庭商品房数量	0 套=0, 1 套=1, 2 套=2, 3 套及以上=3	1.7064	0.7964
家庭平均月收入	赋值为收入区间中位数, 并进行标准化	0.3305	0.8418
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平方	—	0.8163	1.4454
夫妻双方健康状况	夫妻双方均健康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0.3723	0.4839
婚姻满意度 ^①	“我对与配偶的关系有更高的期望(反向赋分)”等 4 项	4.4074	1.149
职业发展愿景	完全不在乎=1, 比较不在乎=2, 中立=3, 比较希望职业成功=4, 非常希望职业成功=5	4.0511	0.6411
夫妻双方是否均来自城市	夫妻双方 18 岁前家庭居住地均在城市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0.2574	0.4377
朋友生育数量影响	影响很小=1, 影响较小=2, 一般=3, 较大影响=4, 影响很大=5	2.0277	1.0657
优生优育生育观念赞同程度	非常不赞同=1, 不赞同=2, 中立=3, 赞同=4, 非常赞同=5	3.2681	0.9622
居住区域为东部	是=1, 否=0	0.5191	0.5002
居住区域为中部	是=1, 否=0	0.2532	0.4353

① 婚姻满意度由以下四个题目测量：(1)我对与配偶的关系有更高的期望(反向赋分)；(2)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现在的配偶；(3)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现在的配偶(反向赋分)；(4)以我们现在对待彼此的方式，我愿意永远和我的配偶在一起。赋值方式如下：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7。

续表			
变量名	衡量方式	均值	标准差
居住区域为东北部	是=1，否=0	0.0723	0.2593
工作日上班时间 ^①	赋值为工作时间区间的中位数	7.5677	2.4059
非工作日加班时间	赋值为加班时间区间的中位数	4.0587	2.6172

(三)模型设定

1. Logit 模型

在建立生育支持政策对高学历女性群体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实证模型时，由于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为 0 和 1 的二分类变量，并考虑到 Logit 回归模型良好的可解释性已被广泛应用在研究二孩生育意愿问题中，本文构建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的 Logit 回归模型如下：

$$P(Child2=1|Pol_{ik},X_i)=\frac{exp(\beta_0+\beta_1Pol_{ik}+\beta_2X_i)}{1+exp(\beta_0+\beta_1Pol_{ik}+\beta_2X_i)}$$

(1)

公式(1)中 $Child2_i$ 为二孩生育意愿， Pol_{ik} 为生育政策支持需求相关变量($k=1,2,\cdots,12$ ，代表 12 个生育支持政策，具体见上文核心解释变量构建)， X_i 为上文所述相关控制变量。

2. 排列特征重要性(Permutation Feature Importance, PFI)

为了解不同类别生育支持政策对女博士生育意愿的相对贡献，本文采用排列特征重要性(PFI)的计算方法进行度量。PFI 计算的思想借鉴了随机森林方法中的可变重要性度量。若某一变量或某一组变量在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则对其值进行随机重排后，模型的性能将显著下降。性能恶化的程度越大，该变量的重要性便越为突出。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将损失函数设为 1-AUC。为增强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行多次排列以降低单次排列的随机性对结果的影响。同时，该方法支持评估变量组的重要性，且结果在不同模型间可比，契合本文对三类政策进行排序与稳健性检验的需求。具体而言，本文采用 R 语言(4.5.0 版本)中的 DALEX 包进行 PFI 的计算，在建立基准模型后，将政策变量分为三组(服务支持、经济支持、时间支持)，

^① 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区间如下：0 小时、0—5 小时、5.1—8 小时、8.1—10 小时、10.1—12 小时、12 小时以上。工作时间赋值按照每个区间中位数赋值，两端的区间按照最大、最小值赋值。

Bootstrap 次数设置为 500，以计算其 PFI 值。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 2 展示了女博士对不同类型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程度。整体而言，女博士群体对于服务支持需求最为强烈(需求程度最高的前五个政策均为服务支持政策)，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的需求程度相对较低。

具体来看，女博士群体对于 0—3 岁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就近享有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政策需求程度较高，此两项政策的重要性得分均在 3 以上；其次是幼儿园“上得起、上得好”(3—6 岁)、孩子离园或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的政策，此两项政策的重要性得分在 2.5 左右；最后是女性友好的就业政策，其重要性得分为 1.88。在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中，女博士群体延长产假的需求程度相对较高，为 1.46，其次是发放养育补贴和设立育儿假，其重要性得分分别为 1.27 和 1.25。设立男性陪产假、在妇女怀孕、产假期间发放生育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或购房优惠、二孩及以上家庭摇号优先或购车优惠，其余政策需求得分均较低，反映出女博士群体对于服务支持需求的迫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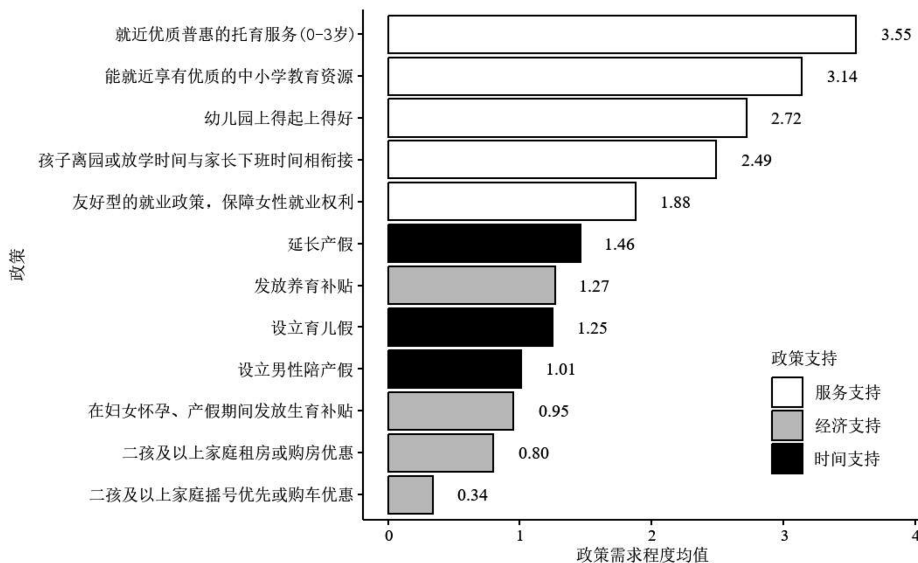


图 2 女博士对不同类型政策支持的需求程度

由前文所述，从韩国生育支持政策实施后效果不佳可知，不同职业发展倾向的高学历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本文选取职业错失焦虑^①和

① 职业错失焦虑以“当您因请假、休产假等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1)我担心自己会错过同事们可能拥有的工作”等 5 道题目衡量。每道题目赋值方式如下：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中立=3，同意=4，非常同意=5。计算题目得分均值后，将得分大于等于 4 的群体划分为高焦虑组，将得分小于 4 的群体划分为低焦虑组。

加班时间^①作为职业发展倾向的衡量指标，样本的职业错失焦虑越高、非工作日加班时长越长，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其越重视事业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②，职业错失焦虑较高的女性群体对于友好型的就业政策、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或购房优惠需求程度较高，而对于延长产假和设立育儿假的需求程度较低。非工作日加班时长超过 5 小时的女性群体除表现出上述特征外，对其他服务支持政策的需求强度也普遍高于低加班强度群体。以上结果说明，职业发展动机较强的女性群体对可能削弱其职业竞争力的时间支持政策(如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等)需求较低，而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兼顾职业发展的就业友好政策、服务支持和住房保障措施。这提示在制定生育支持政策时，应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设计思路，避免“一刀切”式的政策供给。

为了进一步了解女博士对于时间支持与经济支持的具体需求，本文整理了受访者期待的产假时长、生育养育补贴金额与补贴时长。在离群值处理方面，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识别方式：将第一四分位数减去 2 倍四分位间距，第三四分位数加上 2 倍四分位间距以外的数值，确定为离群值。为了使结果呈现更为客观，本研究呈现去除离群值后的统计结果，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产假时长、生育养育补贴期待的描述统计

	样本量	中位数	单位
您期望产假延长至几个月？	208	12	月
您期望在怀孕、产假期间每月每孩发放多少元生育补贴金？	144	2000	元
您期望在怀孕、产假期间生育补贴金额发放多少个月？	156	12	月
您期望在子女养育期间每年每孩发放多少元养育补贴金额？	207	5000	元
您期望在子女养育期间养育补贴金额发放多少年？	215	6	年

由表 2 可知，有 50% 以上的女博士希望产假延长至 12 个月以上；在生育补贴方面，女博士群体期待的每月补贴金额中位数在 2000 元左右，期待的生育补贴发放时长中位数为 12 个月。在养育补贴方面，有 50% 的女博士希

① 以非工作日加班时长的中位数 5 小时作为划分依据，将非工作日加班时间少于等于 5 小时的划分为加班时间短的群体，将非工作日加班时间大于 5 小时的划分为加班时间长的群体。

② 由于篇幅所限，未呈现对比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

望每年发放养育补贴 5000 元及以上,其期待的养育补贴发放时长中位数为 6 年。总体而言,女博士对于生育、养育补贴金额和发放时长均有着较高的期待,目前国家和地区层面共同提供的养育补贴金额尚可,但养育补贴发放时长和产假时长依旧无法满足高学历女性的需求,且差距较大。

四、实证分析

(一)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

在此部分中,本文探讨各类型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公式(1)进行 Logit 回归。并且逐步添加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以保证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和稳健性。表 3 呈现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显示了 12 种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但由于此 12 种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在问卷中设置为排序题,各题目得分总和为固定值,因此将其全部放入模型中会带来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模型(1)进行检验后发现多重共线性确实存在。考虑模型(1)中“设立男性陪产假”不仅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由于该政策并非直接面向女性,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他政策存在本质差异。这一发现与国际研究结论相吻合,Farré 和 González(2019)的研究表明,在西班牙,陪产假可能通过促使女性回归职场,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和降低父亲的生育意愿,进而无法提升家庭后续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考虑该政策被认为对再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在后续分析部分不将“设立男性陪产假”放入模型,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模型(2)显示了除“设立男性陪产假”外,其余政策需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生命周期和环境相关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家庭背景因素,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纳入生育观念(生育动机、价值观体系)因素。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基于模型(5)展开。

在服务支持方面,模型(5)显示,与孩子相关的服务政策对女博士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女性友好型就业政策虽然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说明女博士在服务支持中,对孩子教育和托育的需求较高,对于友好型的就业政策需求相对较低。综上,各类服务支持型政策需求对促进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从而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时间支持方面,延长产假的政策需求能显著促进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

设立育儿假也能够激发女博士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其影响不显著。因此，时间支持型政策中延长产假政策对促进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

在经济支持方面，发放养育补贴对女博士群体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发放生育补贴对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二孩家庭购车和购房优惠也能够对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本文认为经济支持型政策需求对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3 政策支持需求对女博士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就近、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0—3 岁)	0.2666 [*] (0.1507)	0.1265 [*] (0.0654)	0.1662 ^{**} (0.0731)	0.1788 ^{**} (0.0773)	0.1862 ^{**} (0.0801)
幼儿园“上得起、上得好”(3—6 岁)	0.3360 ^{**} (0.1501)	0.1957 ^{***} (0.0639)	0.2402 ^{***} (0.0719)	0.2430 ^{***} (0.0745)	0.2356 ^{***} (0.0776)
能就近享有优质的小学教育资源	0.2718 [*] (0.1509)	0.1336 [*] (0.0692)	0.1730 ^{**} (0.0756)	0.1602 ^{**} (0.0784)	0.1452 [*] (0.0818)
孩子离园或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	0.3288 ^{**} (0.1514)	0.1907 ^{***} (0.0703)	0.2361 ^{***} (0.0796)	0.2450 ^{***} (0.0819)	0.2105 ^{**} (0.0849)
友好型的就业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权利	0.1858 (0.1507)	0.0490 (0.0708)	0.0770 (0.0793)	0.0865 (0.0820)	0.0982 (0.0850)
延长产假	0.3884 ^{**} (0.1553)	0.2526 ^{***} (0.0810)	0.3052 ^{***} (0.0904)	0.3310 ^{***} (0.0936)	0.2850 ^{***} (0.0975)
设立男性陪产假	0.1671 (0.1562)				
设立育儿假	0.2615 [*] (0.1544)	0.1242 (0.0773)	0.1360 (0.0842)	0.1243 (0.0875)	0.1354 (0.0914)
在妇女怀孕、产假期间发放生育补贴	0.2362 (0.1563)	0.1015 (0.0851)	0.1044 (0.0937)	0.0944 (0.0965)	0.1125 (0.0998)
发放养育补贴	0.3901 ^{**} (0.1603)	0.2475 ^{***} (0.0816)	0.3120 ^{***} (0.0905)	0.3383 ^{***} (0.0935)	0.2969 ^{***} (0.0969)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二孩及以上家庭摇号 优先或购车优惠	0.4030** (0.1752)	0.2623** (0.1103)	0.2109* (0.1209)	0.2546** (0.1254)	0.2705** (0.1301)
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 或购房优惠	0.2174 (0.1611)	0.0759 (0.0857)	0.2135** (0.0953)	0.2344** (0.1012)	0.2245** (0.1045)
控制变量	—	—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70	470	443	443	443
Tjur's R ²	0.054	0.052	0.140	0.167	0.239

注：* p<0.1,** p<0.05,*** p<0.01，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回归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健性，除在基准回归模型中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外，本文还从以下 3 个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运用 Probit 模型替代基准回归中的 Logit 模型重新估计。其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二孩生育意愿强度”这一四级有序变量(完全不考虑=1，不考虑=2，犹豫中=3，愿意/非常愿意=4)，将已生育二孩样本的意愿强度赋值为 4，并采用 Ordered Logit 模型拟合。其三，剔除了目前居住在农村和县城的女博士样本，继续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上述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基准模型保持一致，只是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微小差异，说明模型稳健性较好。^①

(三)排列特征重要性

为了解不同类别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对贡献，本研究计算了三类政策支持

的 PFI，其中服务支持包括就近、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0—3 岁)，幼儿园“上得起、上得好”(3—6 岁)，能就近享有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友好型的就业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权利；时间支持包括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经济支持包括在妇女怀孕、产假期间发放生育补贴，发放养育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摇号优先或购车优惠，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或购房优惠。具体结果如图 3 所示。

① 由于篇幅所限，未呈现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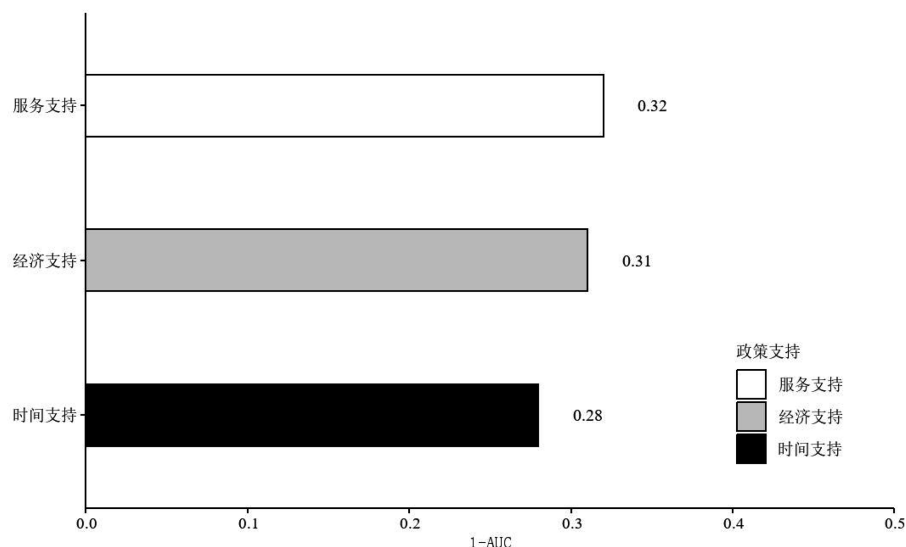


图3 三类生育支持政策重要性排序

由图3可知,对于促进女博士二孩生育意愿,服务支持型政策最为重要,其次是经济支持型政策,最后是时间支持型政策。为验证该排序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其一,对三类政策重排500次得到的PFI值进行差异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政策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H=973.93$, $p<0.001$)。经bonferroni校正的Dunn检验表明服务支持重要性显著高于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Z=7.48$, $p<0.001$; $Z=29.98$, $p<0.001$),经济支持重要性显著高于时间支持($Z=22.50$, $p<0.001$)。尽管三类政策PFI值(0.32、0.31、0.28)差距不大,但检验结果支持排序的准确性。其二,本文基于Probit模型进行了PFI值计算,得到和图3同样的排序结果,验证了各类支持政策贡献度排序的稳定性。由此可知,对于女博士而言,服务支持政策是该群体最需要的政策类型,也是最能促进其生育意愿的政策类型。

(四)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女博士群体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异质性反应,本研究从工作环境生育友好度、工作生活平衡感及经济压力三个维度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4)。

工作环境是否生育友好以“生育一孩时,您的直接领导对您的态度”进行衡量,其赋值方式为:非常不支持/不支持/无所谓/当时非就业状态=0,支持/非常支持=1。由模型(6)和模型(7)可知,在领导持不支持态度的群体中,

各项生育政策需求普遍呈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领导态度为支持的群体中，影响效果相对有限。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友好型就业政策和育儿假政策呈现出独特的“补偿性”特征：这两项政策需求在基准回归中不显著，但是在工作环境生育不友好的样本中促进作用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情境敏感性”，特别强调了女性友好型政策和育儿假政策在改善生育氛围不友好的工作环境中的关键作用，为精准化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工作生活平衡感以“目前我可以很好地分配工作和生活时间”等四道题目测量。将四道题目得分均值作为衡量工作生活平衡感的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平衡感越强。以工作生活平衡感指标的中位数(3.5)划分平衡感强(≥ 3.5)和平衡感弱(<3.5)两个群体。经济压力以家中贷款情况进行衡量，以家中贷款额度的中位数 5000 元作为分割点，将还贷 5000 元以下和没有贷款的样本划分为经济压力小的群体，将每月还贷 5000 元及以上的样本划分为经济压力大的群体。

由模型(8)–(11)的结果可知，各项生育支持政策普遍在工作生活平衡感较低、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中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工作生活平衡感高、经济压力小的群体中促进作用不显著。友好型的女性就业政策在工作生活平衡感较低的群体中发挥的促进作用凸显，设立育儿假在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中促进作用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发放生育补贴的政策需求不仅在基准回归中不显著，对于即使处于相对弱势环境(工作环境对生育不友好、工作生活平衡感低、经济压力大)中的女博士也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综上，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对女博士群体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工作环境生育不友好、个体工作生活平衡感弱、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中，各项政策需求普遍呈现显著促进作用，体现了生育支持政策能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

表 4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生育一孩时 领导支持	生育一孩时 领导不支持	工作生活 平衡感强	工作生活 平衡感弱	经济 压力大	经济 压力小
	(6)	(7)	(8)	(9)	(10)	(11)
就近、优质、普惠的 托育服务(0—3 岁)	0.1319 (0.1035)	0.4407*** (0.1646)	0.0080 (0.1275)	0.3895*** (0.1249)	0.2780** (0.1285)	0.1561 (0.1207)
幼儿园“上得起、上 得好”(3—6 岁)	0.1329 (0.0958)	0.5400*** (0.1642)	0.1472 (0.1231)	0.3436*** (0.1226)	0.2948** (0.1231)	0.2114* (0.1195)

续表						
变量	生育一孩时 领导支持	生育一孩时 领导不支持	工作生活 平衡感强	工作生活 平衡感弱	经济 压力大	经济 压力小
	(6)	(7)	(8)	(9)	(10)	(11)
能就近享有优质的中 小学教育资源	0.1210 (0.1118)	0.2777* (0.1548)	0.1158 (0.1374)	0.1613 (0.1197)	0.3575*** (0.1345)	0.0105 (0.1186)
孩子离园或放学时间 与家长下班时间相 衔接	0.1013 (0.1069)	0.5907*** (0.1735)	0.1055 (0.1425)	0.3418*** (0.1283)	0.3261** (0.1383)	0.1135 (0.1238)
友好型的就业政策， 保障女性就业权利	0.0290 (0.1102)	0.2999* (0.1692)	−0.0039 (0.1386)	0.2371* (0.1261)	0.0985 (0.1273)	0.1036 (0.1350)
延长产假	0.1763 (0.1227)	0.6769*** (0.2082)	0.0922 (0.1507)	0.4825*** (0.1502)	0.4597*** (0.1573)	0.1029 (0.1434)
设立育儿假	−0.0295 (0.1196)	0.5143*** (0.1843)	0.0942 (0.1500)	0.1461 (0.1333)	0.5024*** (0.1638)	−0.0933 (0.1334)
在妇女怀孕、产假期 间发放生育补贴	0.0845 (0.1238)	0.2826 (0.2098)	−0.0265 (0.1598)	0.2546 (0.1564)	0.1811 (0.1570)	0.1606 (0.1551)
发放养育补贴	0.3343** (0.1345)	0.4206** (0.1808)	0.1757 (0.1634)	0.4401*** (0.1417)	0.2975* (0.1529)	0.1649 (0.1413)
二孩及以上家庭摇号 优先或购车优惠	0.2297 (0.1677)	0.4437* (0.2537)	0.0608 (0.1962)	0.4495** (0.1984)	0.4947** (0.2434)	0.1644 (0.1798)
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 或购房优惠	0.0661 (0.1380)	0.6804*** (0.2104)	0.2357 (0.1503)	0.2878 (0.1778)	0.4323** (0.1748)	0.1102 (0.14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64	179	223	220	213	230
Tjur's R ²	0.059	0.143	0.296	0.269	0.059	0.109

五、结论、建议与不足

(一)结论

本文利用 2022 年对全国进行的“高学历女性生育意向”专项研究的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Logit 模型和排列特征重要性计算等方法，揭示了高学历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证实了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对高学历女

性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探讨了哪些政策支持最能促进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识别了对政策支持反应积极的高学历女性群体特征。具体而言,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高学历女性群体对服务支持需求程度最高,其次是时间支持,最后是经济支持。不同职业发展倾向的高学历女性对于政策需求存在差异,职业发展动机较强的女性群体对可能影响其职业竞争力的时间支持政策(如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等)表现出较低的需求偏好,而更倾向于选择能够保障职业发展的就业友好型政策、服务支持措施和住房保障政策。

第二,目前我国规定的产假时长、养育补贴发放年限距离高学历女性的平均需求相差较大。有 50% 以上的女博士希望产假延长至 12 个月以上;在生育补贴方面,女博士群体期待的每月补贴金额中位数在 2000 元左右,期待的生育补贴发放时长中位数为 12 个月。在养育补贴方面,有 50% 的女博士希望每年发放养育补贴 5000 元及以上,其期待的养育补贴发放时长中位数为 6 年。目前国家和地区层面共同提供的养育补贴金额尚可,但养育补贴发放时长和产假时长距离高学历女性的需求依旧存在一定距离。

第三,三类政策支持均对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服务支持型政策对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最大,经济支持型政策次之,最后是时间支持型政策。具体而言,在服务支持型政策中,普惠优质且就近的幼儿园服务和托育服务是对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两个生育支持政策。在经济支持型政策中,发放养育补贴促进作用较强。在时间支持型政策中,延长产假促进作用较强。

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宋健和范文婷(2024)基于成都市育龄女性的研究显示,育龄女性普遍更注重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如“根据生育数量一次性发放补助”“根据生育数量增加购房补贴”“延长女方生育假”“根据生育数量减免个税”“根据生育数量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等。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高学历女性通常职业发展期望更高,因而更重视托育服务等能缓解“工作—育儿”冲突的支持措施,而非可能加剧职业中断风险的时间支持政策和无法达到其需求的经济补贴政策。

第四,生育支持政策对高学历女性群体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工作环境生育不友好、个体工作生活平衡感弱、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中,各项生育支持政策促进作用更为突显,体现了生育支持政策能够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女性友好型就业政策和育儿假政策在上述遭遇生育困境的群体中呈现出独特的“补偿性”特征。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我国高学历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促进我国人口结构平衡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强化教育服务在生育支持政策中的核心作用,以普惠优质的托育、教育服务为支点,构建精准促进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政策支持体系。服务支持是高学历女性最需要的政策支持,也是最能促进其生育意愿的政策类型。而在服务支持中,高学历女性群体对于子女教育服务更为偏好,其核心诉求呈现双重维度:一方面,高学历女性期待教育服务要保障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资源(如幼儿园上得起、上得好;就近享有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学历女性期望子女的教育服务与职业发展相协调(如就近、优质、普惠性托育服务;孩子离园或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进而缓解“工作—育儿”冲突,切实减轻育儿负担。因此,构建高质量的托育和教育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满足高学历女性的核心诉求,更能为整体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关键支撑,从而切实提升该群体的生育意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质量托育和教育服务体系的确立,要在保障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同时,将减轻高学历女性育儿负担、缓解教育焦虑作为核心目的。若普惠、优质、便利的托育和教育体系建立不能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反而因为优质资源有限而加剧教育内卷、强化教育焦虑,那么教育焦虑的提升则会进一步通过加重母职冲突、降低多孩憧憬等多维途径抑制生育意愿(陶涛,2023)。综上,教育支持服务的确是最能促进高学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政策支点,但教育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警惕由于优质资源不均带来对教育公平的潜在影响。

其次,优化经济支持政策,构建分阶段、有梯度、可持续的生育和养育补贴体系。在生育补贴的政策设计方面,不仅要考虑婴幼儿养育成本,更应着重考虑女性产后面临的健康恢复成本和职业发展中断带来的收入损失等现实问题。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了适配未来高素质劳动人口对于经济支持政策的需求,生育补贴可发放至法定产假结束(财政允许的区域可发放至12个月),以覆盖女性产后的关键恢复期,发放的总体金额最好每月不少于2000元。养育补贴的政策可按年龄阶段分梯度设计,对于0—3周岁孩子,可维持现行每孩3600元/年国家补贴标准以及各地叠加的不同孩次的养育补贴;对于3—6周岁孩子,可将现金补贴下调,转向“现金+免费学前教育”^①的双轨支持,帮助家庭平稳衔接学前阶段;对于6周岁以上孩子,在财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8/t20250805_1258143.html。

政可承受范围内,逐步转向可持续的教育服务补贴(如学费减免、课后托管补助等),变“直发现金”为“服务直达”,让补贴真正用于孩子成长的关键环节。

最后,应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组合,灵活调整时间支持政策,增强不同职业发展需求的政策兼容性。应避免“一刀切”式延长产假或推出其他时间支持政策,需要谨慎评估各类生育友好的就业政策是否会给高学历女性带来职业负向影响。应针对不同职业倾向的高学历女性提供可选择的政策组合,使其能够根据自身职业发展需求灵活匹配支持措施。例如,对于事业发展倾向较强的女性群体,可强化就业保障、弹性工作 arrangement 和住房支持,而非单纯依赖延长产假等可能加剧职业中断风险的政策工具。

(三)不足之处

尽管本文系统探讨了我国高学历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及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并识别了对政策支持反应积极的高学历女性群体特征,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进行研究的数据样本大多来自于高等院校,研究结果可以集中反映高等教育行业高学历女性的特征和需求,但由于样本限制,本文未能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在其他行业高学历群体中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 陈梅、张梦哲、石智雷,2023:《公共托幼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第6期。
- 陈滔、胡安宁,2025:《生育支持组合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基于线上调查实验数据的发现》,《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陈祥梅、宁本涛,2024:《“双减”政策影响家长再生育意愿吗?——基于全国29个省份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6期。
- 杜晓静、王振杰、郑翩翩,2023:《现代化视域下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与发展》第3期。
- 黄玉琴、萧易忻,2017:《“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刘畅、靳永爱,2022:《产假政策与生育意愿》,《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 蒙克,2017:《“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牛建林,2021:《中国人口教育发展的特征、结构性矛盾与下一步思路——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相关人口教育统计的发现》,《教育研究》第11期。
- 石智雷、滕聪波,2023:《三孩政策下托育服务可及性与生育释放效应》,《人口学刊》第2期。

- 宋健、范文婷, 2024:《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优化:对象分类与政策组合》,《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
- 宋健、姜春云, 2022:《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国际观察》,《人口与健康》第6期。
- 陶涛, 2023:《教育焦虑传导机制下的低生育意愿及应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王维国、付裕、刘丰, 2022:《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与初育年龄》,《经济研究》第9期。
- 王跃生, 2016:《制度与中国当代生育行为关系分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期。
- 杨慧, 2023:《谁更需要生育政策支持:角色冲突视角下的生育率下降与职业结构优化》,《人口研究》第4期。
- 杨菊华、杜声红, 2017:《部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探索》第2期。
- 张川川、葛润, 2024:《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 张洋、李灵春, 202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人口研究》第4期。
- 朱荟、苏杨, 2019:《基于激励相容理论的韩国生育政策实践检视——兼论对中国的启示》,《人口与经济》第3期。
- Aassve, A. and T. Lappegård, 2009, "Childcare Cash Benefits and Fertility Timing in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1): 67—88.
- Bassford, M. and H. Fisher, 2020, "The Impact of Paid Parental Leave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Economic Record*, 96(315): 402—430.
- Drago, R., K. Sawyer, K. M. Shreffler, D. Warren and M. Wooden, 2011, "Did Australia's Baby Bonus Increase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irth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0(3): 381—397.
- Duvander, A. Z., T. Lappegård and G. Andersson, 2010,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Fathers' and Mothers' Use of Parental Leave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Norway and Swede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1): 45—57.
- Farré, L. and L. González, 2019, "Does Paternity Leave Reduce Fert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72: 52—66.
- Glavin, P., M. Young and S. Schieman, 2020, "Labor Market Influences on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Canad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8—89: 102417.
- Kalwij, A., 2010,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y Expenditure on Fertility in Western Europe", *Demography*, 47(2): 503—519.
- Kim, T. W. and M. S. Jang, 2024, "Changes in Housing Satisfac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Married Young Households after Moving into Public Rental Housing", *Journal of the Korean Housing Association*, 35(3): 13—20.
- Miller, W. B. and D. J. Pasta, 1993, "Motivational and Non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ld-Number Desir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5(2): 113—138.

Which Type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s More Likely to Encourage Highly Educated Women to Have a Second Chi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Support, Time Support, and Economic Support Policies

XU Mei-qi¹, XIONG Xin-yu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shrinking population and a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exploring the demands of highly educated groups for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holds significant forward-looking valu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is area. Based on the “Highly Educated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 special survey data conducted among female doctors and female doctoral students in 2022, this article for the first time explores the demands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for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highlighting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types in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and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s that respond positively to policy support.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Primarily,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demand for fertility policies based on career development tendencies. Women with stronger career development motivations have relatively weaker demands for time support policies (such as extending maternity leave and setting up parental leave) and a stronger inclination towards service support policies (such as employment-friendly policie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policy supply and demand. The duration of maternity leave and the duration of child-rearing subsidy disbursement have not met the expectations of highly educated women.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y demands vary. Service support policies have the best promotion effect, followed by economic support policies, and lastly, time support policies. Finally,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exhibit a relief effect for those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Various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have a more promine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groups that have encountered fertility difficulties, demonstrating the “timely assistance” role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Key words: highly educated women; a second child; fertility desir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责任编辑: 梁文艳 责任校对: 梁文艳 胡咏梅)